

风物

潘受故居

潘高鹏



秋初

庄丽英



▲潘受故居(本报记者李想摄) ▲潘受故居内部(潘高鹏供图)

一

乐峰,这座隐匿于南安市东北隅的僻静小镇,宛如一颗被岁月尘封的明珠。唐末,名士李元溥因看破红尘,隐居于闽南深山。当有人问其隐居缘由,他淡然回应:“仁者乐山。”自此,这座山得名“乐山”,小镇也被唤作“乐峰”。

令人惊叹的是,这座看似平凡的小镇,宛如一座摇篮,孕育出了众多蜚声海内外的杰出人物。潘受、潘亚墩、潘旭澜、潘明继、潘耀明等,他们犹如熠熠生辉的星辰,在各自的天空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

在镇中心乐峰街311号,推开那扇不起眼的木门,走进,里面就是新加坡“国宝”——被钱钟书称为“大笔一支,能事双绝”、被章士钊视为海外诗人三鼎足之一的著名书法家、诗人、教育家潘受的故居。

二

1911年,潘受诞生于乐峰。这一年,辛亥革命如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,为早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带来一线曙光。然而,闪电过后,中国依旧深陷军阀混战、民不聊生的深渊。

乐峰因地处偏僻而避开了战火纷扰。潘受生于富裕家庭,父亲潘习鹏是村里备受尊敬的中医,不仅医术精湛,更钟情诗书,曾拜名举人、翻译家林琴南为师,考取秀才,家中时常飘荡丝竹雅音。在父亲熏陶下,潘自幼聪颖博记,五六岁便能将看过的诗文倒背如流。在这般优渥且充满文化气息的环境中,他的少年时光安宁而快乐。

10岁那年,潘受告别乐峰乡村,前往泉州,入读培元小学四年级。培元中学作为当时“泉州地区的最高学府”,让天资聪颖的潘受如鱼得水。他在此系统接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双重洗礼,书法方面更得到泉州知名书法家林翀鹤和曾振仲的赞赏指导,为日后他在书法和文学领域的非凡造诣奠定基石。从初中起,潘受便创作诗歌、散文,不时在厦门、上海等地知名刊物发表,展露才华。1927

年,潘受参加“全国拒毒论文比赛”,所作万言长文《拒毒运动与民族主义》被蔡元培等组成的评审团评为第一,获颁金盾奖。潘受因此被誉为“少年状元”,17岁便被学校破格聘为兼职教师,教授初中三年级国文,高中毕业后续聘为正式教员。

一时之间,风华正茂的少年潘受青春飞扬,意气风发。

三

作为乐峰人,我每次回到家乡,心底总会涌起难以言喻的安宁与亲切。这里的草木山川,仿佛都烙印着前贤的足迹,回荡着他们在悠悠岁月里的浅吟低唱。

每次经过乐峰街311号,我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投向那扇大门,久久凝望。仿佛透过大门,能瞥见翰墨残影,听见诗词轻诵,能从中汲取人文精神的滋养。

因家族析产,潘习鹏分得祖屋后部土地,在前部院落宅院基础上,兴建了相连的两进建筑,即三落、四落。其格局独特,既保留四合院古朴风韵,又融入洋楼风格。其中三落为两层高建筑,沿中轴线设两层宽大连廊,穿过天井与四落相连。这里便是潘受一家曾经的居所,他的少年时光大多在此度过。或许,他曾无数次坐在天井石阶临帖习字,笔墨渗入砖石缝隙;或许,他曾无数次倚着二楼栏杆眺望远山,任诗句如山间云雾般流淌。

然而,声名鹊起的潘受不幸被土匪盯上。土匪头子妄图寻人充当军师,威逼利诱将潘受“请”去。潘受不齿与之为伍,于1930年仓促离乡漂泊南洋。抵达新加坡后,他凭借深厚文字功底,先担任《叻报》编务,后于华侨中学、道南学校和麻坡中学担任教师、校长。

潘受的命运轨迹就此转折,但故乡始终是他心底最美的风景。流离途中,他曾写下“出国只因忧国乱,此去迢迢万里外。离家未是为家贫,何时重赏故园花”,字里行间尽是对故园的眷恋。如今,老宅虽破败,每一道裂痕却如时光史官,诉说着家族与时代的故事,见证着岁月沧桑。

四

潘受的艺术成就是一部将诗书

完美交融的家国史诗。其笔下既有文人风雅韵致,又饱含战士炽热担当。诗歌,是他倾注爱国情怀与时代记录的重要载体。

1937年,抗战全面爆发,潘受借“喜峰口”壮举写下七绝:“大刀出鞘凛纵横,荡决时闻杀一声。五百健儿喜峰口,记将血肉补长城。”以“血肉补长城”的悲壮意象,抒全民誓死抗战的意志。1939年,他为到南洋巡回义演募捐的武汉合唱团创作《卖花词》,成为抗战募捐必唱歌曲,极大激发南洋民众爱国团心。1940年,他义务出任南侨慰劳团团长,带领一个由54人组成的团队回国,穿越滇缅公路战火,深入中原战区,慰劳各地的抗战将士。1942年,日寇占领新加坡,潘受携家人辗转流亡重庆等地,一路见闻化为笔下为民族存亡歌泣的诗篇。前线劳军之际,《老河口》中“破虏心争壁壘垒,遗民泪望旌旗”,抒写了誓死杀敌的决心和驱逐寇寇的无限期盼;而流亡途中,五十首《集杜少陵句五言律》借杜诗之语,抒发了自身在抗战及流亡岁月的境遇、情感与思考,传递出浓厚的忧国忧民之情与身世之感。那十余年间,他以如椽诗笔,饱蘸血泪,记录烽烟,咏叹山河,堪称时代“诗史”。

当时,潘受与章士钊、于右任、沈尹默等名儒交游游艺,才三十出头的他,赢得文坛巨擘竞相赞誉,章士钊甚至发出“诗在南洋”的慨叹。

五

在新加坡书法中心光前堂内,悬挂着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训——“爱我中华”。这幅由潘受题写的书法作品雄浑大气,每一笔都饱含他对故土和母语文化的深情。

潘受的书法由颜虞入手,上追汉魏六朝,临摹钟鼎石鼓,中年研习草书,晚年多作行书。他一生转益多师,融会贯通,自成一格,深受钱钟书、刘海粟、徐悲鸿、俞平伯等人赞誉。

潘受晚年寓所命名“海外庐”,显然寄托着对“海内”乐峰祖宅的深切怀念。门楣上悬挂他亲题的匾额,两旁对联“岂有文章漫劳车马,虽然城市不碍云山”,既是居所写照,更是他半生漂泊、心系故土的注脚。每逢客至,他必展纸挥毫以书会友。徐悲鸿、郁达

夫、章士钊、于右任、傅抱石、刘海粟、关山月、钱钟书、俞平伯、叶圣陶等名家,都曾在此谈艺论道。茶香墨韵中,这南洋一隅,俨然成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世外桃源。

然而,1999年潘受逝世,2002年“海外庐”易主,匾额与题字尽被抹去,故居化作寻常宅院。曾有人提议改建为纪念馆,终因现实考量未果。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会长陈声桂叹道:“潘先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”

但潘受的诗书早已超越一方屋宇的局限,《海外庐诗》在海内外广为传诵,书法作品镌刻于南安的九日山、天柱山、郑成功碑林、乐峰潘氏家庙及山东曲阜孔庙、西安碑林、武汉黄鹤楼等地,成为中华文化血脉无声而坚韧的延续。

六

“故人已作山中客,往事空怀海外年。”潘受当年这句怀念与友人共历海外漂泊岁月的诗,如今,也成了我们对先生最深切的怀念。

好在潘受故居虽已荒废,但依然存留着。新加坡狮城书法篆刻会会长丘程光曾多次专程拜谒,在青砖墨痕间追寻先生足迹;新加坡国立大学陈煜博士也数度考察,以学术视角丈量古厝的文化厚度。这些跨越山海、充满敬意的寻访,恰如文化根系的自然延伸与生长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,空间如何阻隔,这座深植于故土、承载着潘受少年时光与家族记忆的祖宅,始终散发着强大的精神引力。

近日,听闻潘受故居即将修缮,这不仅是对砖木梁柱的扶正与加固,更是对一段渐行渐远的文化记忆的郑重召回与复归,是让“海外”的思念与“海内”的故园,在这方修复的屋檐下,重新连接、对话,续写那份因岁月和离散而中断的深沉情感。

暮色渐沉,轻抚老宅斑驳的砖墙,恍惚间,那位谦和长者提笔挥毫的身影仿佛仍在,而关于文化根脉赓续的答案,早已深深铭刻在这片土地的砖石草木间,流淌在那些不朽的诗行墨痕里,静待每一个后来者心怀敬畏的辨认、守护与书写。



冷月

洪剑敏



月色如水
月华如练
当云彩拥抱着月亮
月色温柔抚摸着云彩
那清冷的余晖
是月亮特有的矜持
抑或是人间的冷色调

广寒宫的寂寞
似高处不胜寒的冷宫
月光下的芸芸众生
是鸟虫鸣啾的夏夜
是鸡鸣犬吠的寻常
谁说
只羡鸳鸯不羡仙
那是他不曾拥有的
凡尘俗世的悲欢离合
仙人更应该羡慕吧
这人间真实的烟火气
欢喜,遇见
天上,人间

评说

让记忆在黑暗中显影

——《南京照相馆》观后感

翁郑榕

走出电影院,我的眼前仍浮现出那盏暗房里的红灯。在那片昏暗中,一张张底片缓缓浮现——不是风景,不是笑容,而是同胞的尸骸、江边的血水、孩童被摔向墙壁的瞬间。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没有用血腥画面刺激感官,却用“显影”这一过程,将历史的痛感一寸寸注入我的心里。

这部影片最打动我的是,它讲的不是英雄,而是普通人在绝境中找回尊严。阿昌最初只是为了活命,冒充学徒,颤抖着为日军冲洗照片;林毓秀被迫在敌人面前唱曲求生;老金一家躲在地窖,连天容都不敢看。他们不是战士,只是想活下去的凡人。可正是这些人,在看到底片上无法掩饰的暴行后,一个个选择了“不

再沉默”。他们偷偷把底片证据缝进衣服,用生命传递真相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:真正的勇敢,不是不怕死,而是在恐惧中依然选择做对的事。

最让我泪目的是,老金在出城前那句:“谁能活下来,就把照片交给法庭。”这不是豪言壮语,而是一个父亲、一个被侵略的中国人对正义最后的托付。他最终倒在枪口下,但那张底片,却成了后来审判战犯的关键证据。

这让我想到今天——我们每天拿着手机,看热搜,刷短视频,可有多少人还记得那些不该被遗忘的名字?当历史逐渐远去,记忆正在被稀释,这部电影像一记警钟:真相不会自己浮现,它需要有人坚持冲洗,有人愿意传递。

影片中,日军强迫百姓拍“良民照”,背景是“中日亲善”的布景,而镜头外却是刺刀与哭喊。这种荒诞与残忍的并置,让我心头一紧。更讽刺的是,多年后,幸存者林毓秀站在战犯面前,举起相机,拍下了他们低头受审的瞬间。曾经被拍摄的受害者,终于成了历史的记录者。

今天的我们,生活在影像泛滥的时代。人人有手机,随时能拍照录像。可越是这样,我越觉得这部电影的珍贵。它提醒我们:影像不只是娱乐,它可以是证词,是抵抗,是照亮黑暗的光。当某些国家试图篡改教科书、否认历史时,当网络上有人轻描淡写地说“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”,我们更应记得,那间小小的照相馆

里,有人曾用生命守护一张底片。影片结尾,众人在以为获得生路时,齐声哼起《城门城门几丈高》。幕布上闪过故宫、长城、城隍庙……那一刻,照相馆成了中国的缩影。他们笑着合影,像在庆祝团圆,却走向死亡。这一幕让我泣不成声——他们守护的,不只是自己的命,更是文化的根。

今天的中国,早已不是当年的中国。但我们仍需警惕:和平年代的回忆,最容易被消解。《南京照相馆》告诉我们,记住历史,不是为了延续仇恨,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。每一个记得的人,都是历史的显影液;每一次讲述,都是对亡灵的告慰。

愿我们永远记得:在黑暗中坚持显影的人,才是真正的光。